

# 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

## ——以日本四日市市大气污染为例

高娜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 环境污染如何被讲述? 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与污染治理有怎样的联系? 带着这样的疑问, 本文以日本四日市市为例, 描述并分析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 在四日市市从“重污染城市”转变为“环境重生城市”的过程中, 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活动如何变化。四日市市的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活动, 在最初的环境污染抗争时期, 发挥了揭示问题、联系环境污染受害者与环境抗争运动等作用; 在环境污染诉讼结束后, 污染作为问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继续对未完的污染问题进行“可视化”建构; 当环境改善取得一定成果后, 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超越了污染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对立, 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形塑活动之一。

**关键词:** 环境污染; 环境抗争; 公害; 污染治理; 社会讲述

【中图分类号】 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5)01-0064-10

### 引言

#### 1. 环境污染与问题建构

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如果不被“发现”并作为问题提出, 环境污染治理也将无从开始, 即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需要经历“建构”才有可能成为“问题”并进入“问题解决”阶段。然而, 反思环境污染的历史与现实, 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脉中, 同样的环境污染, 其建构主体、建构方式以及建构结果不同。并且, 在环境污染的建构中, 污染受害者不是环境污染讲述主要力量的情形亦不少见。那么, 环境污染究竟如何被讲述? 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与污染治理有怎样的联系?

#### 2. 日本的污染治理经验与日本环境社会学

二战后的日本,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初, 实现了令世界惊异的经济快速发展, 但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 以至于日本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公害列岛”。20世纪震

惊世界的环境污染八大公害事件中有四件是在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发生或者加剧的。然而, 之后日本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也众所周知: 被污染的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政策建设不断完善、体系化;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的研发跻身世界前列。这些成果与二战后日本环境污染受害者所经历的苦难和日本公民社会的奋起、艰辛并坚持不懈的抗争密不可分。

也正是立足在如此的经验之上,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产生、发展并凝练出其独创的理论。在针对环境污染, 特别是工业产业活动给居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领域的研究中, 日本环境社会学在把握受害、“加害-受害”结构与反污染运动两方面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上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 这一点成为日本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当带着“环境污染是如何被讲述、建构, 并且如何逐渐得到解决”的问题重新梳理并细读日本环境

【收稿日期】2014-10-27

【作者简介】高娜(1978-), 女, 天津人,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环境社会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2014SJD033); 东南大学新进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时,笔者有如下的发现。

“受害结构论”与“加害-受害论”揭示了环境污染受害者所承受之害具有多重结构:由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不适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苦痛,令其家庭生活水准降低,迫使其家庭更改其生活设计,使受害者及其家庭的人际关系恶化、甚至在地域生活中陷入被疏离的境地<sup>[1]</sup>,而多重受害背后存在着连锁的、派生的加害过程<sup>[2-3]</sup>。正是因为污染受害者承受的不仅仅是健康损失,而且加害过程具有连锁性、派生性,所以污染受害者出于自我保护反而对污染及受害选择沉默。换言之,“受害结构论”与“加害-受害论”在为我们勾勒污染受害者的受害整体结构、动态把握加害过程的同时,解释了污染受害者受苦但难言、受苦但不愿言的原因。

在日本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研究中,长谷川公一指出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社会功能之一是“揭示环境问题”<sup>[4]72</sup>。而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研究不只关注运动如何发现、揭示环境问题,更关注运动这一集体行为如何发生、持续、衰退。并且,环境污染抗争运动所研究的多为问题纠纷高潮期,对于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或运动逐渐低潮后的事态发展关注不多。

20世纪70年代初,以四大公害诉讼胜利为代表,日本反对产业环境污染的环境污染抗争运动取得胜利,并推动了当时日本治理环境污染的制度建设。之后,日本产业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环境改善逐步开展。数十年过去,进入21世纪后,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产业污染受害者的当下现状,其中有的介绍了受害者运动开始向“环境创造运动”转型,有的介绍了环境运动开始有关“公害记忆”的活动<sup>[5-7]</sup>。除了在研究领域中被提及的地区以外,在现实中,诸如水俣市、四日市市<sup>①</sup>、大阪市等曾经是日本产业环境污染重灾区的地方,现在都有着不同形式的环境污染纪念设施与学习设施以及讲述环境污染的社会活动。

### 3. 本文的研究课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经济腾飞早于中国。也正因为此,日本比中国更早开始经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灾难,有着更长的挣扎、奋斗

历程。今日的中国正处在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时期,反思日本经验,可以给中国带来前瞻性的启发。本文以日本四日市市大气污染治理为例,在资料文献分析与访谈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从20世纪50年代末大气污染发生直至今天,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环境污染是如何被讲述的;并分析随着污染治理的开展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是如何变化的。

## 二、案例分析

### 1. 四日市市与四日市哮喘

四日市哮喘常被列为20世纪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四日市哮喘病与熊本水俣病、新潟水俣病、富山骨痛病并称为二战后日本的“四大公害病”。20世纪70年代初,经历了长时间的诉讼斗争之后,围绕四大公害病展开的法律诉讼案件均以原告居民方的胜诉而告终。此后,日本有关公害的制度建设进程加快,全国环境治理污染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四日市市是位于日本中部地区三重县<sup>②</sup>的海滨工业城市,面临太平洋,港口条件良好。二战期间,日本海军工场曾建在四日市市海滨。二战后,日本经过十年完成了战后恢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强有力地推动重工业发展、区域开发和能源转型。其间,1955年日本决定在四日市市滨海建设由外国石油资本与国内资本共同出资的石油化学联合大型工场,此举使四日市市成为日本全国区域开发的示范城市。国内外大资本的联手、与煤炭相比成为新能源的石油、代表现代化的大型联合工场等,这一切都让刚从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的日本及四日市市当地人民对联合工场抱有极大的期待。虽然规模大,但联合工场的建设高效推进,1959年四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各工场就全力开始运转。

然而,联合工场的运转立刻给工场周边环境带来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恶臭、海水污染、噪音、震动等问题突现,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且,短时

<sup>①</sup>“四日市市”这一表达中“四日市”是该市的名称,第二个“市”的意思是城市。

<sup>②</sup>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县”下设“市”、“町”、“村”行政区域。

间内工场周边居民很多开始罹患呼吸道疾病。但是,环境污染与居民的病痛未能抑制经济发展的步伐。四日市市滨海又相继建成第二与第三石油化学联合工场。20世纪60年代,联合工场引发的污染日益严重,四日市市环境污染抗争运动开始形成。特别是随着污染的加重,居民健康问题凸显,以致“四日市哮喘”成为当时日本家喻户晓的词语。1967年,在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支持下,九名受害居民将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六家大企业推向被告席,四日市哮喘公害病诉讼开始。1972年7月,经历了将近五年的诉讼斗争,原告居民方取得公害诉讼的胜利。此后,随着日本全国污染治理步伐的加快,四日市市也拉开了污染治理的新序幕。20世纪80年代,四日市市环境改善成果逐渐显现;1990年,由政府、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了四日市市国际环境技术转移中心,四日市市开始向其他地方与国家传递在治理污染中积累的技术经验;1995年,四日市市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500佳环境奖。至今,四日市市海滨的石油联合工场依然没有停止运转,企业生产依然会给环境带来负荷。

以下,本文将按照四日市市环境污染治理的阶段性,分时期描述并分析在四日市市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及其变化。每个阶段的描述与分析均将关注环境污染社会讲述行为的发生、主体、内容、功能。

## 2. 环境污染抗争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

①工场周边直接污染受害者个体层面的问题转变为日本全国的问题。在上文中曾提及,1959年四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开始全面运转,便即刻给周边环境带来了明显且严重的影响,如空气污染、恶臭、海水污染、噪音、震动等。特别是在邻接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盐滨地区,居民生活受到了各种干扰:工场噪音与震动影响居民休息、孩子学习;工场粉尘弄脏居民晾晒的衣服;带有化学气味的恶臭、浑浊的空气令居民不敢开窗;渔民捕捞的鱼中出现了带有石油臭味的“异臭鱼”,而且“异臭鱼”问题不断加重。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全面启动给周边带来了突发的、深

程度的、多重的污染,污染不仅给周边居民带来生活上的困扰,而且使居民的生计也受到影响。

污染发生后,受影响的居民迅速通过当时既有的日常组织发出声音,集体性地讲述环境污染。在日本,自治会是地缘型居民自治组织。1960年,盐滨地区联合自治会对全体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全面掌握了居民的受害状况,并向四日市市卫生科反映了情况;同年,渔民们通过其行业组织“渔业协同组合”向三重县反映了海水污染问题。接到问题反映后,四日市市成立了“四日市公害对策委员会”,将其作为市长咨询机构,并且在四日市市市民报《广报四日市》(1961年10月1日)上公布了盐滨地区联合自治会所做的居民受害调查。在污染发生初期,居民在个人层面因环境污染所受的困扰通过既有的居民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得到讲述,成为居民、渔民集体层面的困扰,并且促使体制内产生了对应行动。

盐滨地区居民的行动、市政府的回应又令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引发的环境污染在四日市市内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四日市市的社会党、共产党等政党组织,市议会议员和市政府职员工会、地区劳动工会、市医师会都开始了反对环境污染的活动。

此时,日本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四日市市被视作区域开发的示范城市,在开发示范地的四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造成的环境污染,引起了日本全国的震荡。日本中央政府把四日市市的问题作为政府课题并派“黑川调查团”、“都留调查团”到四日市市进行实地调查。有各种产业开发计划的地区也都分别派考察团到四日市市,全国性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也开始对四日市市的环境污染进行各种报道<sup>[8-10]</sup>。一时间,四日市市由产业开发先进地区转为污染先进地区,四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周边的环境污染也变为日本全国关注的焦点。

②与污染受害者脱节的公害抗争运动。四日市市公害由联合工场周边的问题成为了日本全国的问题,讲述四日市市公害的社会主体已经不只是联合工场周边直接受害的居民,反对公害的主要力量也不再是联合工场周围的受害居民。莲见

音彦<sup>[11]</sup>、山本英治<sup>[12]</sup>、小野英二<sup>[8]</sup>的研究都指出受当地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四日市市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与革新派政治势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领导公害抗争运动。当时,执掌市政的保守势力贯穿居民自治组织,而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共产党、地区劳动工会以及市议员都在积极开展公害抗争活动,并且成立了“四日市公害反对协议会(简称公对协)”作为组织公害抗争运动的组织。由于政治色彩的分歧,四日市市公害抗争运动没有得到市民的广泛支持。

由革新势力组成的“公对协”在四日市市内发动了数次千人以上规模的反公害集会与游行活动,这些活动经过媒体报道在外人眼里呈现的是四日市市公害抗争运动高昂的状态。但是,“其实体非常冷清”,“市民看运动的眼光也非常冷漠”<sup>①</sup>。2009年,笔者在四日市市采访当时“公对协”事务局工作人员泽井余志郎老先生时,他如下回忆:

“公对协”会给各个劳动工会提出要求,这次是2000人的集会,你们工会要动员多少人参加,参加人就是这样被调动起来的。经过电视和报纸一报道,好像四日市市的运动很热烈,但实际聚集起来的人,1000人也好,2000人也罢,上次安保运动你和你参加,这次反公害运动你和你去参加,都是这样被动员来的。运动结束,大家去啤酒园喝啤酒,之后就散了<sup>②</sup>。

从泽井余志郎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四日市市的公害抗争运动是依靠“公对协”对工会组织的动员能力来进行组织的。运动参加者中有很多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参加到活动中的,这样组织而成的公害抗争运动虽然以“反对公害”、“根除公害”、“救助公害受害者”为口号,但是与污染受害者渐渐脱节。

1966年,为了悼念因无法继续忍受污染折磨而自杀的居民,“公对协”再次发动了“反公害市民集会”。泽井余志郎作为“公对协”事务局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站在泽井余志郎身边的污染受害居民中村留次郎很生气地质问泽井“你们在说反对公害,反对公害,但是你们真的知道公害的可怕吗”<sup>③</sup>?由此可见,在四日市市公害

抗争运动的过程中,运动逐渐与污染受害者脱节,依靠运动组织自身的人员动员能力开始独行。

③连接污染受害者与污染抗争运动的“公害记录讲述运动”。在1966年悼念自杀的公害受害者的市民集会上,“公对协”事务局工作人员泽井余志郎被污染受害者中村留次郎质问。在中村留次郎的怒气中,泽井余志郎意识到,“高呼‘反对公害’固然是勇敢的行为,然而污染受害者的痛苦却不为人所知,只有在了解受害者的实际状态之上,反公害才是真正的反公害”。

以此为契机,泽井余志郎开始了自己的反公害运动,他开始探访在县立盐滨医院住院的哮喘病患者。在医院,他亲眼看到即便在“清洁空气病室”也会犯病的患者在哮喘发作时的痛苦。同时,他还频繁地去污染最严重的盐滨地区矶津村落,渐渐地,泽井余志郎融入到受害居民中去,与受害居民建立起信赖关系。之后,泽井余志郎开始用录音机录下受害居民用方言讲述的公害,然后原封不动地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受害居民读了泽井整理出的文字说“我竟然说得这么不错,看来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是谁说的?这个人用矶津话讲出的都是实话,我也想这样来说说真心话”。泽井余志郎的公害记录得到了污染受害者的认可,并且为污染受害者讲述污染开辟了新途径。

1967年9月,在反公害运动的支持下,九名盐滨地区矶津村落的哮喘病患者把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六家大企业告上了法庭,四日市哮喘病公害诉讼拉开序幕。这些原告居民均患有哮喘,而被告企业则均是资本雄厚的大公司。身患重疾的原告居民难以完成对被告行为违法之处的举证,在法庭上支持原告的是由56名律师组成的原告律师团,但是这些律师中不在四日市市的占绝大多数。在公害诉讼开始后,原告居民方需要各种后援工作,为此,公害抗争运动的轴心也转移到支持受害居民进行诉讼的方向上。

<sup>①</sup>这段话来自四日市市制作的四日市公害纪实片《讲述四日市公害 第三集(市民运动篇)》。参见:四日市市. 四日市公害を語るビデオ第3卷(市民運動編) [MT]. 2004.

<sup>②</sup>这段话来自2009年12月8日笔者在四日市环境学习中心对泽井余志郎进行的访谈记录。

<sup>③</sup>泽井先生的话取自2008年8月10日笔者在四日市港口大厦对泽井余志郎进行的访谈记录。

诉讼开始的第二年,泽井余志郎开始以“公害记录会”署名,编写并印发蜡纸刻写的《记录·公害》文集。文集里记录着泽井余志郎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受害者对公害的讲述,还有“公害日志”的栏目,里面按时间顺序客观列着某段时间内发生的与四日市市公害相关的各种事件。

虽然开始只是我一个人做,以“公害记录会”为名,是想如果有愿意一起做的人可以加入,当然不愿意做的时候随时退出<sup>①</sup>。

为了反对公害而来到四日市市的一些有志者协助泽井余志郎共同进行公害记录活动。在公害诉讼期,每集《记录·公害》印发300至600册,一部分免费赠给受害居民与原告律师团;一部分文集有偿提供,获得的资金用作印刷工本费和诉讼支援金。

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给四日市市带来的不仅仅是大气污染,工场的废水排放造成了严重的海水污染。1968年,田尻宗昭作为海上保安官被派到四日市市维护海上安全,在任期间,田尻宗昭发现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中名为“石原产业”的企业将工场废水直接排入海中。田尻宗昭揭发了石原产业的罪行,使其受到刑事起诉,而田尻宗昭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来自公害记录的影响。田尻宗昭对公害记录如下回忆“其中一个一个的记录,都是公害受害者血与汗的人生记录,有着巨大的震撼力。公害记录让我深刻地领会到——公害不只是ppm,而是人的公害。这对此后我致力于公害事件的影响之大,无法说清”。

《记录·公害》文集不仅为污染受害者开辟了讲述污染的途径,而且为原告律师团及支持受害居民诉讼斗争的人们提供了受害居民的真实感受,成为联系四日市市反公害运动与受害居民的纽带,同时,公害记录也成为其他反公害斗争人们的精神鼓舞。

在四日市市污染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环境污染抗争期,四日市市的环境污染首先由联合工场周边的受害居民通过既有的体制通道被讲述出,推动了污染的“问题化”。此后,四日市市公害受到全市乃至日本全国的关注,四日市市内反公害运动兴起。环境污染讲述的主体从受害居民

转为媒体与运动,被讲述的内容变成反公害的口号、反公害运动的报道,逐渐与污染受害者疏离,环境污染抗争运动逐渐受到污染受害者的质疑与批判。在对运动的批判与反思中,站在污染受害者方的公害讲述活动重新形成,缩短了反公害运动、受害居民的支持者们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

### 3. 环境污染改善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

1972年7月,四日市市哮喘病公害诉讼以原告居民的全面胜诉告终。在与之前相差不多的时间内,包括四日市市哮喘病诉讼在内的四大公害诉讼均以受害居民的胜利而结束。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在国家层面开始加快治理环境污染的制度建设。四大公害诉讼的胜利作为反公害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制度建设步伐加快。

在四日市市,反公害运动取得公害诉讼胜利的成果后,开始逐渐衰退。四日市市外部对四日市市公害的关注也逐渐减少。图1显示了1950—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对四日市市公害报道数的变化,其中可以很明显地确认到公害诉讼结束后媒体对四日市市公害关注程度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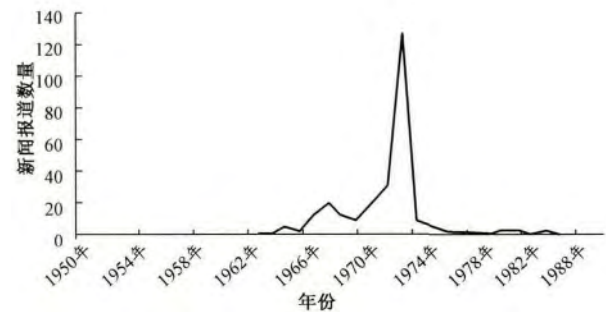


图1 《朝日新闻》有关四日市市公害报道的数量变化(1950—1984年)<sup>②</sup>

受害居民虽然取得了公害诉讼胜利,但是联合工场的机器与设备并没有停止运转,哮喘患者的病症也没有即刻出现好转,四日市市的天空依然是灰色的。笔者分析指出,公害诉讼后,在四日市市,逐渐形成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化限制型公

<sup>①</sup>这段话来自2009年12月8日笔者在四日市市环境学习中心对泽井余志郎进行的访谈记录。

<sup>②</sup>2010年5月16日笔者利用朝日新闻的《闻藏II》“1945—1989年朝日新闻微缩版”数据库,以“四日市 & 公害”为条件进行了检索,图1是根据检索结果制成。

害控制体系”,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污染加剧、改善环境的作用。1976年,四日市市地区的硫磺氧化物的排放达到了环境标准的要求。1981年,四日市市环境污染地区居民呼吸道疾病的新增率与非污染地区相同。但是,在四日市市地方性公害控制体系的作用下,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是“满足环境标准要求”意义上的减少,并非实现了污染零排放<sup>[15]</sup>。

在公害诉讼结束后,泽井余志郎的公害记录活动没有停止,其坚持追踪并记录诉讼后污染地区与受害居民的状况,并且整理了1972年前与公害抗争运动、公害诉讼相关的诸多资料,继续编写、印发《记录·公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小学社会科课程中设有“公害”这一单元,一些小学老师联系泽井余志郎希望获得有关公害资料的帮助,并且人数不断增多。泽井余志郎有求必应,把自己保存的公害材料复印后送给对方,如果对方要求,他还会见面亲自为对方讲解四日市市公害的历史。在无偿提供公害资料、讲述公害污染的活动中寄托着泽井余志郎这样的期望“不只是作为社会科上课的材料,至今四日市市公害依然没有结束,希望教师们不仅能够通过学习认识公害,并且能够为根除公害而奋斗。希望至今的公害记录能够有助于包括受害居民在内的市民去正视公害”<sup>[13]23-24</sup>。对于自己的记录与讲述活动,泽井余志郎则抱着这样的态度“只要公害还在,即使不采用诸如告发之类积极的抗争形式,但我会把公害记录一直坚持下去”<sup>[13]32</sup>。

1984年,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出版了记录四日市市公害的书,名为《くさい魚とぜんそくの証文(异臭鱼与哮喘的证词)》<sup>[13]</sup>。此书初版印刷了2000本,上市后四月初版本数售罄<sup>[16]</sup>。该书不仅收录了《记录·公害》各集小册子中记录的诉讼结束前受害居民的话语,同时还收录着诉讼后受污染地区的变化与原告患者的话语。例如,四日市公害诉讼一周年时,原告患者批判道“‘米本判决’<sup>①</sup>的意义完全被葬,一周年后的今天患者没有得到救助”<sup>[13]221</sup>。在胜诉三周年纪念时,原告患者批判了用钱进行赔偿的问题解决方法;在胜诉十周年纪念时,原告患者对环境标准的批判,这

些来自受害居民的批判都以居民话语的形式记录在书里。

公害诉讼胜诉后,国家层面与四日市市层面的污染治理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污染依然存在。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不再以尖锐对抗的形式表现,对于不在污染区生活的人而言,问题变得隐蔽。此时,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公害记录活动继续记录污染受害者的话语,为污染受害者提供话语表达的渠道,并且通过公害学习资料、书籍的形式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虽然与之前的反公害运动相比,记录公害的方式算不上积极的告发行为,但是在污染作为问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后,关于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公害记录发挥着将未完的污染问题“可视化”、重新进行问题建构的功能,公害记录也是对市民发出的正视公害、坚持与公害作战的行动号召。

#### 4. “环境时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日本的大众话语、媒体话语以及政策话语中“公害”一词的出现频率渐少,取而代之的是“环境”。有关温室效应、气候异常、臭氧空洞等地球规模环境问题的话题变多。环境问题不断复杂化、多样化,国际间有关环境问题的官方与民间活动也日益活跃。

在四日市市,产业污染的形态不再是高浓度的污染排放,不再给当地居民带来明显的健康损伤。1990年,四日市市国际环境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四日市市开始向其他地方与国家传递污染治理中积累的技术经验。1995年,四日市市制定了《四日市环境基本条例》;同年,四日市市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500佳环境奖,并发布了《舒适环境城市宣言》。在四日市市,比起“公害”、“污染”,“环境”一词开始更多地出现在政策话语和人们的生活话语中。然而,笔者指出,曾经产业污染严重的四日市市滨海地区,如今产业污染排放被“环境标准”赋予了正当性,低浓度的污染物排放成为合理的、日常的行为,污染对于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从显在转为潜在;同时,在四日市市

<sup>①</sup>四日市市公害诉讼的审判官姓米本,所以四日市市公害诉讼判决又称“米本判决”。

污染治理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口与城市街区由临海部向内陆部转移,临海地区出现空洞化<sup>[17]</sup>。如此这般,在四日市市,产业污染依然存在,但是其形态变得更加隐蔽,20世纪60年代严重的产业污染逐渐成为历史,在时间上远离市民,并且由于治理污染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产业污染从空间上也与市民的视野渐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四日市市产业污染的讲述活动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97年7月24日,污染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的代表、公害诉讼原告律师团代表、四日市哮喘病公害诉讼运动的参加者、医生等集聚四日市市,召开了四日市市公害诉讼25周年纪念集会,集会回顾了对公害诉讼的意义,并且讨论了公害诉讼25年后四日市市公害的现状。集会发表声明“今年7月24日是四日市市公害诉讼判决25周年纪念。诉讼判决后,在污染受害者与市民运动组织、三重县、四日市市、企业的努力下,激剧的公害污染没有了。但是至今还有大约650名的公害认定患者在哮喘发作的病痛中挣扎。硫磺氧化物的浓度虽然大幅降低了,但是氮氧化物的浓度这十年一直居高不下,我们很难说其达到了三重县制定的环境目标值”<sup>[18]</sup>。集会还号召市民“大家一起确认四日市公害诉讼判决的意义,让公害真正消失,共同建设自然环境丰富、宜居的城市”。同时,集会呼唤企业“积极公开环境与灾害方面的信息,促进居民参与,与居民共同保护环境与安全,创造对话机会”。为了践行号召与呼唤,集会参加者决定成立“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简称市民塾)”。在“环境时代”,集会再度讲述了环境污染,并把环境污染治理与城市建设连在一起。集会参加者都是曾在公害抗争运动中以及公害诉讼斗争中与污染企业站在对立立场上的人,但是,在25周年的纪念集会上,他们对企业的态度从对立转为希望对话。

以这次集会为契机成立的“市民塾”以泽井余志郎为中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泽井余志郎一直坚持公害记录活动,1997年他已年近70岁。市民塾秉承的组织运营方针是“好加入好退出,把市民塾办成开放式的组织”<sup>[19]</sup>。自1997年成立以来,市民塾定期开公害学习例会:有的年度例会是

每月举办,有的年度例会是隔月举办;从2007年开始,学习例会固定为每月第四周的周一举办。例会参与频度最高的人员构成了市民塾的主要成员,他们多为四日市市内中小学以及大学的工作人员、联合工场企业的退休人员、大学生、主妇,这些主要成员不仅参加例会,还负责企划、准备其他形式的公害学习活动。

市民塾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公害资料的整理与保存,其主要活动成果可以总结为如下四点。第一,发行了100期名为《公害市民塾·瓦版》的公害资料集。资料集里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四日市公害的资料、报纸简报,资料集选用B4纸,每期页数不等,最多41页,最少1页,平均19页。第二,编辑了10册《四日市公害学习指南》。2007年,发行了该学习指南的CD版。第三,从成立时起,市民塾就开设了网络主页,在主页上介绍、记录市民塾的活动,选取登载公害资料的精粹,并且开辟问答版块,回答浏览者有关四日市市公害的问题,搭建了让更多人认识四日市市公害的平台。第四,整理公害照片并将照片数据化。2009年6月到2010年8月,市民塾整理了1972年公害诉讼判决前的1503张照片、1973—2004年的753张照片,并且制成了照片数据库供公害学习使用<sup>[20]</sup>。这些资料整理保存活动都是市民塾成员自发的无酬活动,遇到向市民塾咨询公害学习资料的学校与个人,市民塾会无偿提供这些学习资料。此外,市民塾每年还会接到10~50所中小学的邀请,直接给中小学生学习公害历史,带领学生们参观学习曾经污染严重的地区。

不仅如此,市民塾还加强了与行政机关的沟通。长期以来,市民塾通过给城市长期计划书提建议、与环境部长对话等形式,要求市行政开设公害资料保存与学习的硬件设施<sup>[21]</sup>。在市民塾的推动下,2001年,四日市市环境部主页上开设了“公害资料馆”栏目;2005年,在四日市市环境学习中心里开设了公害资料室;2010年,“整備开设公害资料馆”写入了四日市市新的城市综合发展规划《四日市市新综合计划(2011—2020年度)》中。

此外,市民塾的活动弥补了“环境”教育与“环境”学习中缺失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在四

日市市先后成立了四日市市环境技术转移中心与四日市市环境学习中心:在环境技术转移中心讲述的是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与政策;在环境学习中心举办的多是关于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观察动植物、观察自然等的“环境”学习与实践活动。与之不同,市民塾组织重新学习的、讲述的、保存的公害资料是来自污染受害者的话语,是从污染受害者的角度看到的公害。市民塾为什么要坚持污染受害者的立场?通过活动想要传递怎样的信息?市民塾在编写的学习资料中如下表述:

渔民因为发臭的鱼受尽了苦,哮喘发作让公害病患者感受到死亡的痛苦,洗干净的衣服被工场粉尘弄脏,吐奶的婴儿,看着吐奶的婴儿疼在心中的母亲,甚至忍到极限走上绝路的人们……我们的今天、污染治理对策的进步是建立在这些污染受害者痛苦经历之上的。我们必须牢记在心,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sup>①</sup>。

公害,特别是受害者的体验、实际状态的记录、保存与相关信息传播,对于不再重蹈公害悲剧覆辙、建设舒适环境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事情<sup>②</sup>。

在大谈“环境”、逐渐忘却“公害”的“环境时代”里,在四日市市,站在污染受害者立场上的环境污染讲述活动重新展开。重新展开的讲述活动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污染讲述活动的历史积淀之上,并且以市民团体活动的形式稳定地、日常地进行。污染讲述活动不是为了对立与告发,而是与城市建设联系在一起,使断裂的“环境”与“公害”重新接轨,并且注重推动行政行为。在四日市市,产业环境污染曾给四日市市带来痛苦的记忆,给城市印象带来负面的影响。今天,历史逐渐远去,面对痛苦的历史,有的人选择不主动提起,有的人选择更快地扭转城市整体的负面影响,有的人则选择重新提起。在这多元的选择中,市民塾的环境污染讲述活动已经超越了污染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对立,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形塑活动之一。

### 三、结论与思考

本文追寻着四日市市产业污染治理的历史进程,分时期考察了各个时期的污染讲述活动及其

变化。

首先,从环境污染社会讲述的主体来看,环境污染社会讲述主体随着环境污染治理进程而不断变化。在污染发生初期,污染直接受害居民的生活地缘组织——自治会、行业组织——渔业协同组合代表受害者集体发声,使环境污染成为问题进入行政视野与公众视野。污染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作为社会问题得以呈现。此后,四日市市内的政党系统的组织、工会系统的组织以及医师会等组织、四日市市外的媒体与各种调查团等各主体也纷纷关注产业污染、调查污染,开始为反对环境污染发声,非污染直接受害者的人群也开始集体性地关注、讲述环境污染。继而,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为反对环境污染新的运动组织出现,强力表达着反对污染、批判污染、要求解决问题的意愿。其间,在对已有公害运动组织的反思中诞生了直接记录污染受害者话语的活动,成为连接污染受害者与反公害运动的纽带。公害诉讼结束后,四日市市公害逐渐淡出社会关注的视野,反公害运动的大部分活动也逐渐落幕,但其中的公害记录活动依然继续,污染受害者的话语与公害现状的记录没有停止。而且,公害记录的成果没有停留在个人层面,而是通过资料与书籍的形式在社会中传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环境时代”后,产业环境污染逐渐被忘却,此时曾为反对公害而奋起抗争的相关者再次集会,促生了新型的环境污染社会讲述活动。在新时代下,环境污染社会讲述活动吸收新的市民力量,以市民团体的形式稳定、日常地展开。在四日市市,环境污染社会讲述的主体在不断更新。体制内的社会整合组织的配置状况,体制外社会运动生成、运作以及自省的能力,市民团体形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是促使四日市市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主体出现并实现更替的社会条件。

其次,从环境污染社会讲述的内容来看,污染

<sup>①</sup>此段话引自市民塾2007年发行的CD版《四日市公害学习指南·四日市公害判决35周年》。参见: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四日市公害ガイドブック集 四日市公害判决35年(CD),市民组织自制CD,2007a。

<sup>②</sup>此段话引自市民塾编辑的《四日市公害学习指南》第六册扉页。参见: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四日市公害学習案内ガイドブック,市民组织自编资料,№6。



刚出现时,直接受害居民讲述的是与生活、生计息息相关的、具体的污染受害状况。环境污染成为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投入公害抗争的社会力量增多。随之,在环境污染的讲述中,用“反对公害”、“根除公害”、“救助公害受害者”的抽象口号或理想、用科学数据讲述的内容变多,环境污染的讲述开始与直接污染受害者脱节。此时,泽井余志郎开创的公害记录活动重新将直接受害者的话语带入环境污染社会讲述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产业污染状况得到一定改善,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技术积累与政策应对作为经验被不断讲述传递。同时,从曾经的污染抗争运动产生并且坚持而来的公害记录运动也得以重组并坚持从污染受害者的立场讲述环境污染,使得被忘却的痛苦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令“环境时代”中的污染讲述内容更加全面。

在四日市市,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在最初发挥了揭示问题、推动解决问题步伐的功能,是对负面问题的应对。现在,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活动已经在城市建设特别是在舒适城市环境建设这一城市正向良性环境的创造中找到定位。在四日市市长达半个世纪的产业污染治理过程中,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中只有少部分是由污染直接受害者承担,更多的由市民社会承担,并且随着市民社会力量凸显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从四日市市经验中反观中国,包智明等在回顾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与反思、重新理解中国经验二者相结合时,指出“当前我国的环境抗争抑或治理陷入了一个看似无解的困境,其根源不在于发展主义的幽灵而在于‘社会’缺席”<sup>[22]</sup>。而四日市市的经验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一幅“社会”在场的环境治理图景。日常的居民组织、职业行会、劳动工会、运动组织、有识之士团体、大众媒体、市民组织等,四日市经验中的“社会”是多元的,而且“社会”在场贯穿污染治理数十年的过程。一方面,一些团体与组织在组建时的目标并不是治理环境污染,其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只是原有组织功能的延伸与扩大。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一部分团体与组织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具有自身调整、重新定位的能力。或许对环境污染治理而言看似

间接,但社会整合的组织配置状况是如何促进或制约环境污染治理的社会建构的?环境污染发生或者预测到环境污染即将发生时,已有的与环境污染无关的社会组织与团体是否可以将功能扩大与延伸到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经历了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冲突与交锋后,环境污染治理功能能否再次嵌回日常的市民组织与生活中去。这些看似间接的问题,实质上影响着环境污染治理的进程,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研究和现实进程中给予更多的关注。

#### 参考文献:

- [1] 飯島伸子. 環境問題と被害者運動 [M]. 東京: 学文社, 1984.
- [2] 飯島伸子, 船橋晴俊. 新潟水俣病問題: 加害と被害の社会学 [M]. 新版. 東京: 東信堂, 2006.
- [3] 関礼子. 新潟水俣病をめぐる制度・表象・地域 [M]. 東京: 東信堂, 2003.
- [4] 長谷川公一. 環境運動と新しい公共圏: 環境社会学のパスpekティブ [M]. 東京: 有斐閣, 2003: 72.
- [5] 堀畑まなみ. 公害・環境被害地域の再生活動 [M] // 鳥越皓之, 帯谷博明. よくわかる環境社会学. 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9: 121.
- [6] 関礼子. 環境問題の原点はいま [M] // 関礼子, 中澤秀雄, 丸山康司, 等. 環境の社会学. 東京: 有斐閣, 2009: 221 - 243.
- [7] 関礼子. 新潟水俣病と阿賀野川 [M] // 鳥越皓之, 帯谷博明. よくわかる環境社会学. 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9: 153.
- [8] 小野英二. 原点・四日市公害 10 年の記録 [M]. 東京: 勁草書房, 1971.
- [9] 四日市市. 四日市市史: 第 19 卷 [M]. 四日市市, 2001.
- [10] 吉田克己. 四日市公害: その教訓と 21 世紀への課題 [M]. 東京: 柏書房, 2002.
- [11] 蓮見音彦. 石油コンビナートと公害: 三重県四日市市調査 [M] // 福武直. 地域開発の構想と現実Ⅲ.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65: 5 - 107.
- [12] 山本英治. 住民運動の展望 [M] // 松原治郎.

- 公害と地域社会: 生活と住民運動の社会学.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社, 1971: 173 - 253.
- [13] 沢井余志郎. くさい魚とぜんそくの証文 [M]. 東京: はる書房, 1984.
- [14] 田尻宗昭. 四日市の記憶 [M] // 沢井余志郎. くさい魚とぜんそくの証文. 東京: はる書房, 1984: 12.
- [15] 高娜. ローカルな公害制御システムの形成過程: 四日市公害の発生源対策に注目して [J]. 名古屋大学社会学論集, 2009, 30: 155 - 173.
- [16] 朝日新聞. 沢井余志郎さん: 反公害の魂なお健在 [N]. 朝日新聞, 1984 - 08 - 18.
- [17] 高娜. 公害経験地域における問題様相の変化: 四日市公害を事例として [J]. 名古屋大学社会学論集, 2010, 31: 23 - 45.
- [18] 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 四日市公害判決 25 年・集会アピール [EB/OL]. [2014 - 08 - 29]. [http://www.yokkaichi-kougai.tcup.ca/museum/contents2/siminjuku/kiroku/frame\\_k.htm](http://www.yokkaichi-kougai.tcup.ca/museum/contents2/siminjuku/kiroku/frame_k.htm).
- [19] 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 塾通信 [市民组织自编资料] 2007 - 11 - 10.
- [20] 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 四日市公害の写真 デジタル化 2 [EB/OL]. [2014 - 08 - 29]. <http://www.yokkaichi-kougai.tcup.ca/siryu/60-2010-08-07-08-42-32.html>.
- [21] 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 資料保存施設要望書 [EB/OL]. [2014 - 08 - 29]. <http://www.yokkaichi-kougai.tcup.ca/siryu/62-2010-08-08-01-01-49.html>.
- [22] 包智明, 陈占江. 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 向度及其限度: 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J]. 社会学研究, 2011(6): 196 - 210.

## Public Narrative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A Case Study of Yokkaichi Air Pollution

GAO Na

( School of Humanities , Southeast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6 , China)

**Abstract:** How will environment pollution be narrated by the public? And how will narrative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late to pollution control?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narratives of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that Yokkaichi being transformed from a "heavily-polluted city" to "environmentally-regenerated city" since 1960s until now. In Yokkaichi, the public narratives of pollution helped to reveal the problems, contact the victims of pollution and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sts. After the pollution lawsuits in the city, when pollution as a big problem gradually faded from public views, public narratives in Yokkaichi did not cease and continued to reveal the unsolved pollution. While som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recovery of polluted-environment, the narratives were transformed from confrontational stances between the pollution victims and polluters to one of the city's collective memory shaping activit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protests; public nuisance; pollution control; public narratives

【责任编辑: 章 诚】